

在1938年发生的台儿庄战役中，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达100余名。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女记者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发出一篇篇战地报道和通讯。她们以笔作枪，抨击邪恶，揭露日军暴行，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成为当时战场上的“明星”。

邓珂云：新婚蜜月赴前线

香港《立报》记者邓珂云是进入台儿庄前线采访比较早的记者，并且是在新婚蜜月期间与丈夫曹聚仁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3月，鲁南台儿庄已是烽火四起，硝烟弥漫。武汉的报纸和电台天天报道台儿庄的战况。相恋四年刚刚举行了婚礼的曹聚仁、邓珂云，在新婚之夜决定奔赴前线采访，向所在的新闻单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立报》报告后，分别被命为战地特派记者。他们从汉口乘坐火车向台儿庄进发。邓珂云在报道中写道：“出了荒漠的郑州市，火车在遍地黄沙的平原中行驶了十七八个小时，记者于前晚(25日)到达徐州。”3月25日，邓珂云夫妇到达徐州后，和几位外国记者一同采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有一位外国记者看到一个年轻的女记者上前线采访，感到很好奇，特别请邓珂云和李宗仁合影。

4月5日，邓珂云和曹聚仁来到台儿庄前线，采访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为了抢发大捷新闻和掌握战役的全局情况，邓曹二人于4月6日下午搭乘军车赶回徐州。邓珂云及时将收集到的战斗情况发往《立报》。4月7日，《立报》在一版头条位置登出了《台儿庄外敌陷重围，将被我分别击破》，第二天又在二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台儿庄我军大胜》的报道。

邓珂云的战地通讯另辟蹊径，没有直接描写战斗惨烈、悲壮的场面，而是从街市的商业经营和民众动员反映战斗胜负情况。刊登在《立报》1938年4月10日的战地通讯《徐州民众总动员》，报道了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为支援台儿庄前线，妇女、儿童、学生、壮丁都动员起来了，“4月1日下午，我们去参加了侯集的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五、六千乡民，他们中的壮丁都手持武器，显示着雄赳赳的神气。”

张郁廉：第一个到旅部的女记者

塔斯社女记者张郁廉曾与苏联的同事深入到一线阵地采访，被覃异之将军称为“第一个到旅部的女记者”。

张郁廉祖籍山东掖县，精通俄语。1934年9月入燕京大学学习，后成为塔斯社记者。1938年2月，塔斯社总社派谷礼宾斯基等几位军事记者到鲁南采访，安排张郁廉陪同前往，既是翻译，又是记者。

3月中旬，他们来到位于台儿庄东北的第20军团52军25师73旅，覃异之少将接待了他们。张郁廉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

【故地往事】

巾帼赴前线 纤笔胜毛瑟

□郑学富



邓珂云与丈夫曹聚仁在台儿庄前线



张郁廉在壕沟里躲避日机低飞扫射轰炸



黄薇在台儿庄前线留影

郁廉写道：“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又神秘又恐怖。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当记者们完成采访任务与覃异之告别时，覃异之望着张郁廉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说着掏出一支手枪递给张郁廉手中说，“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在后来的采访中以及辗转长沙、武汉、重庆等地时，她一直带着这个“纪念品”。

黄薇：最后撤退的华侨女记者

1938年5月27日，在武汉的新华日报社举行招待会，欢迎和慰问从台儿庄前线突围归来的各报记者。青年记协总干事范长江在会上表扬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局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留在前线继续采访战地新闻。

黄薇于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来到武汉报名参加了武汉新闻界组织的战地记者团。记者团20多人，女记者就黄薇一人，为了战地行动方便，黄薇把一头秀发剪短，时髦的衣裙换成了军装，俨然一个小战士的形象。

他们到达徐州后，与先期而来的范长江、陆诒等中外记者会合，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白天深入炮弹横飞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将士，晚上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报道。就在记者们紧张忙碌的时候，前方战斗也是异常激烈，津浦全线天天激战，日军的飞机每天都轮番轰炸徐州，日军的快速部队直奔碭山，企图切断陇海线，鲁南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五战区司令部察觉了日军的企图，命令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记者跟随部队一起突围。长官部考虑黄薇是一名女记者随军突围困难，让黄薇和长官的家属一起乘车撤退。可是黄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决定与记者们一起行动。

黄薇和抗敌剧团的女团员被分配跟随关麟征的52军行动。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追赶，他们昼伏夜出，隐蔽行军，为了避免掉队，每人脖子上系上一条白毛巾。为不被敌人发现，一律不准吸烟，打手电，不准讲话，甚至连咳嗽都要控制，默默地在茫茫黑夜中行走。一路上险象环生，有时候日军追上来还要打一仗。5月下旬，黄薇安全回到武汉，参加了《新华日报》的欢迎招待会并合影留念，黄薇作为唯一的女性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史海钩沉】

劝戒缠足出奇招

泰山女神像小脚换大脚

□李俊领

晚清时期，山东泰安有个官员，叫毛激，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六年(1900)、二十八年(1902)三次出任泰安知县，多有政声。

毛激十分关注地方的民间泰山信仰习俗，这在泰山脚下的蒿里山神祠建筑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蒿里山在泰安城西南三里远的地方，相传为人死后的魂魄归宿之地，汉代发端的“泰山治鬼”说所言的具体地方即蒿里山。

山下建有森罗大殿、望乡台、戏楼等建筑，殿中有“三曹对案，七十五司，各塑神像”。光绪初期，蒿里山的神祠多圯，仅存大殿。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知县毛激捐款重建了这里，据说工程用银万两，营造出一个“使观者惊心动魄”的地府世界。他在为蒿里山神祠题写的两副对联中交待了修建目的。

一是森罗殿对联，联云：“聿古来帝祀群神，亢父主死，梁父主生，岂独草仪逢汉代；为天下人心一哭，德不能化，刑不能威，只可尚鬼学殷时。”二是蒿里山戏台对联，联云：“销肠怜孝子忠臣，拍案冲冠，犹觉不平千古后；冷眼看神奸巨猾，收场结局，何曾放过一人来。”

这两副对联表达了毛激对“礼教”衰落的哀伤，更清楚地表白了他重修蒿里山神祠的心迹：其一，清末人心涣散，一则在于朝廷提倡的伦理道德不能教化民众，二则朝廷掌握的刑罚也失去了往昔的威慑力。因此，作为知县的他在没有能力改变这种颓废局面的情况下，只能像殷商时期一样崇尚鬼神之说，以化导民心。其二，他崇尚鬼神之说，不是为了向鬼神祈福，而是宣扬鬼神主持参与下的善恶报应的因果律。在他看来，虽然忠臣孝子生前死后的遭遇可能不够公平，但作奸犯科的忤逆之人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这就是历史因果律的公平与正义所在。

显然，毛激积极利用了“泰山治鬼”的传统信仰，发挥其教化人心的功能。这一做法得到了泰安地方士绅、民众的肯定。由此直到民国前期，蒿里山为宗亲亡灵祈福的香社络绎不绝。而且，清代一些香客在泰山舍身崖轻生以显孝心的行为时有发生，所谓“孝子为亲祈寿，必投崖下”。毛激为杜绝泰山舍身崖轻生的现象，将“舍身崖”易名为“爱身崖”，又在舍身崖前修筑了一道红墙。每年三月泰山举行香会时，派十余壮士守护于此，“不令游人窥足其间”。

相应于毛激在泰山的禁舍身之举，山东地方官员还利用泰山信仰行“废缠足”之政。光绪初年兴起的“废缠足”运动虽有中外人士的极力倡导，但在推行中仍是困难重重，在中国北方各省尤其如此。庚子国变后，清廷宣布要实行新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谕令劝止缠足。

因为守旧势力庞大，山东各地的放足运动开展得较为缓慢。为加快推广放足运动，山东地方官员将泰山碧霞元君神像与天足运动联系起来。

泰山神憩官中供有一尊碧霞元君像，“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每届春夏，朝拜者仕女如云，且多制锦鞋为娘娘寿”。由于北方民众普遍信仰碧霞元君，这一神像的“三寸金莲”就成为显示女性缠足正当性的神符号。

为了利用民众的信仰习俗并打破此神圣符号，山东地方官员将神憩官的碧霞元君神像的“小脚”去，另换大脚两只。以娘娘亦实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妇女”。

这种顺势而为的“广告”，适应了当时乡村妇女大多不识字的文化状况，要比劝止缠足的宣传书更有效力。乡村妇女在为碧霞元君神像做鞋子的活动中，通过这位神像的榜样作用，较为容易地接受放足的观念。

【大众讲坛预告】

古琴的前世今生

古琴是中国独有的乐器，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古琴文化的守望与传承者，高培芬老师从事古琴艺术研究、演奏、教学已近五十年，为中国非遗项目“诸城派古琴”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3月10日，高培芬将做客大众讲坛，为读者带来题为《太古回声——漫“弹”古琴的前世今生》的讲座。讲座时间：3月10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书馆(二环东路)一楼报告厅



【老照片】

1979年的爱情

□冉庆亮

过年整理相册，这张摄于1979年见证我们爱情的照片再次映入我的眼帘。

我的爱情很有些戏剧性。我12岁那年冬天，家里住了8里外芦家村的一帮河工，其中有个叫朱元武的帅小伙，挖河晚归总让我陪他下象棋。一来二去，他说我“聪明懂事”，说等我长大给我说个媳妇。谁想，13年后的1979年，他真给我说了个媳妇儿。当时我在部队当兵，父亲就拿了姑娘的照片，夹信嘱咐我跟姑娘“见字如面”，不想，双方竟一见钟情。

两个多月后，我回家探亲，在朱元武家跟姑娘见面了，原来朱是她的姐夫。这之前，姑娘到我家看过，5间破屋住着父母和我三兄弟，家境十分寒酸。而家境富裕且当民办教师的她却嫌弃。虽说我已五年老兵，可每月只有15元津贴，除买生活用品外，还要寄回些贴补家用，我根本买不起金戒指，便塞给她一条手绢儿作订婚礼物。5月10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按老理儿，我得送她一大笔彩礼钱，外带“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可她啥也不要。我表示歉意，她却说，这样节俭办婚事好，若为结婚拉一屁股债，以后还得还。家里连我们的被子都没有，结婚那天，母亲借了两床被子装门面，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母亲硬塞给我妻子40元钱，要她做床被子。可我临回部队，妻子却将这笔钱给了我做盘缠。1981年初我退伍了，到公社当了每月只有20元薪金的通讯员，而妻子执意放弃民办教师转正机会，来到我家照顾父母，耕种责任田。物质贫乏的年代，爱情也受到制约，可遇到通情达理的爱人，同样很幸福。

